

“科学”流变与晚清中学“科学化”路径的探索

——以近代史学为中心

张帆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科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相伴生。基于“科学”意义的多歧,近代学人各取其道探索中学“科学化”的路径。国粹派视“科学”为一个调和新旧的学术范畴,以中学为本位沟通“科学”,复兴古学。梁启超等人服膺进化论,将“科学”理解为叙述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章太炎反对以西方成例为定则的“科学”,但他的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却成为颇具争议的长久话题。身处“科学时代”的近代学人,无论自觉与否,都怀揣着各自的政治理想,运用着似是而非的“科学”概念,参与到中学“科学化”的进程之中。

关键词:晚清;科学;中学;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7)02-0026-11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7.02.002

19、20 世纪之交,近代学人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1](P.2)按照 1937 年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所称,“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2](PP.319-320)运动的第一期始于 1884 年,最为卓特者有 12 人,其中梁启超揭橥了“新史学”,拉开中学“科学化”的序幕,同时使用“科学”字眼较多的还有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人。运动再次发生已是 1917 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投身“整理国故运动”的民国学人被直接称为“科学派”[3](PP.3-4)。在短短的十几年间,

国学研究已与“科学”概念紧密联结。

“科学”概念的出现对于近代中学重构的影响巨大,当代学人对此早有关注,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①,但研究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科学”概念对于中学的评判与裁剪,而把“科学”作为一个已知、固定的概念加以运用,甚至用后出的观念与具体语境下的“科学”认识强行对应,忽略了“科学”一词自身的意义差异与发展脉络。本文聚焦“新运动”的第一期,尝试将“科学”以及中学“科学化”的进程视为两个同时存在的变量,勾连二者作动态的历史考察,更为深入地甄别言说者的立场与真实意图。

收稿日期:2016-09-01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歧变”(14FZS03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帆,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①相关研究成果可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582—709 页;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裂变中的传承: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 217—254 页;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 年。

一、“以西学证中学”

“科学”一词是19世纪末进入中国的日本汉语借词。分科是概念的基本形态,狭义上言,仅指符合实证科学标准的学科,但不限于自然科学范畴;广义上言,凡分科之学均可称为“科学”。“科学”合形上/形下之学为一炉,打通了自然科学与其他分科学术之间的阻隔。由于自然科学具有不言自明的正确性,形上之学因此具有了成为真理的可能。以之衡量中国学术,狭义“科学”差之天壤,可径取东西;广义“科学”模糊了学术界域,留下格义的空间。近代日本作为成功转型的范例,以及东文东学在地理、语言、功能上提供的便利,使得西学东来衍成主流,追求“科学”成为时代共轭。

但是,“科学”概念从进入中国伊始,就存在意义撷取上的差异。20世纪初,关于中学与“科学”的关系曾经有过一场学术讨论[4],趋新的留日学生认为中国根本无“科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改造中国学术;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没有“科学”,欲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以《新世界学报》为首的保守者认为中国自古就有“科学”,首揭国粹主义,提倡复兴古学。近代学人其实是怀揣着各自的政治理想,踏上中学“科学化”的进程。他们在用“科学”概念条理中学的同时,也在对“科学”概念进行着分解与重构。

《国粹学报》在发刊词中述其旨趣“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换言之,“以西学证明中学”将是一个双向度的过程:一方面证明中学是“科学”,一方面以中学为本位沟通“科学”。对于前一个过程,邓实解释得颇为明白“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菑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暂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5]保存国粹的目的清晰可见。对于后一个过程,国粹派少有明确的说明,但在言行中有迹可寻,如编写中学教科书本身就是以西学形态规范中学,以达到沟通“科学”的目的。当时国粹派学人运用的“科学”意义颇为庞杂,或以“学”、“学科”等字眼表达相似的含义,与“科学”相对的中学也时常以“古学”、“国学”、“旧学”等不同词汇表达,文

中不再另外说明。

执著于“以西学证中学”的近代学人多是“中国有学”论者,但所说之“学”并不一致。黄节推崇的“国学”范围甚广,称中国自秦以来数千年专制之下“不国而不学也”,如今欲“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6]许之衡认为国学出于孔子:“孔子以前虽有国学,孔子以后,国学尤繁,然皆汇源于孔子,沿流于孔子,孔子诚国学之大成也。”[7]邓实则意在诸子,认为“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8]虽然欲证之学不同,他们在古代文本中找寻“科学”的路径不外两种:一是与“科学”形似,具有与“科学”相似的分科形态,国学立为专门,本身就是对西学分科形制的模仿与回应。[9](P.9)二是与“科学”质同,具备与近代科学同样的学术特质,如客观性、进化性、系统性等等。但不管类比形式如何进行,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保存国粹。

倡“经学”一路者,多在“六经皆史”的思路下接榫“科学”。刘师培认为“孔子六经之学,大抵得之史官”,“是则史也,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开也。吾观古代之初,学术铨明,实史之绩”,“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10]陈黻宸也主张经学即史学,“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11](P.675),于是经学化约为“科学”的总体。陈黻宸还说,“夫经者,古人理想之所寄,精神之所萃,而借以启万世天下之人之智者”,有“天下公例”存之,且将“洋溢放溢于数千载以后”,如欧洲古希腊诸哲之说在今日大效明验,经学也可以在今后盛行。[12]由此证明经学乃中国“科学”的学术源头,不但具有分科形态,无学不包,且蕴含国族精神。但是作为“科学”的经学与西方“科学”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未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其穷理也,不问其始于何点,终于何极。其论事也,不问其所

致何端,所推何委”,至今日“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以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是故“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7]概括而言,经学但有科名,却已是不问统系,不求因果,失其精神实质。

由于以“科学”本有为前提,复兴古学便是在原有的学术基础上加以改造,纳经学入教科,完成形式上的接榫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1899年梁启超以西方教科书形式论孔学,“孔门之为教,有特别、普通之二者”,“普通之教,曰《诗》《书》《礼》《乐》,凡门弟子皆学之焉。《论语》谓之雅言,雅者,通常之谓也。特别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13] (P. 56) 刘师培说六经“或为讲义,或为课本。《易经》者,哲理之讲义也。《诗经》者,唱歌之课本也。《书经》者,国文之课本也(兼政治学)。《春秋》者,本国近世史之课本也。《礼经》者,修身之课本也。《乐经》者,唱歌课本以及体操之模范也”。其中《诗》《书》《礼》《乐》为寻常学科,《易》《春秋》为特别学科。^[14] (P. 19) 许之衡也说“六经在当日,诚为孔子之教科书,而今则全解此教科书者绝鲜。无他,昔之教科书,与今之教科书,体例不同故耳。使易以今日教科书之体例,则六经可读,而国学永不废。”^[7] 陈黻宸亦是晚清主张分科治学的先行者之一,一生致力于用西学的方法和眼界条理中国学术。

但是,随着形制的改变,经学地位不得不为之一变。按照许之衡所说“欲存经学,惟有节经与编经之二法。一变自来笺疏之面目,以精锐之别择力,排比而演绎之;采其有实用者,去其无用而有弊者,著为成书,勒为教科;除去家法之见,一洗沉闷之旧,如是则经乃可读。”^[7] 于是六经之内便有了有用/无用、有弊/无弊、家法/分科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瑕瑜互见。刘师培指出经学有四弊:信人事而并信天事、重文科而不重实科、有持论而无驳诘、持己见而排异说^[15], 实则以西方近代科学性质为参照,承认六经不具备客观性、可实验性、逻辑性以及学术自由。当各种改造之法无不以西学为标准进行自我检视,任何形式的删改都将削减经学在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弱化其权威性。

为此,陈黻宸强烈反对编经一事,甚至认为编经之毒较秦始皇烧经尤甚,“烧经而经犹可存,

编经而经必尽废”。在学术上,如“最完全无缺之古经”而卒成类书,“必欲割而裂之,以置之于《渊鉴类函》《子史精华》之列,非至愚者不足与于斯矣”,“必大专制家借以行其秦皇愚黔首之妙策者也”,“有非其人之必大不通,而于其经之文、经之体例,一无所知,一无所闻”,最终将如“孙叔通制礼乐,而古帝三王之遗遂以湮没沦丧,二千年迄于今,而终无恢复之日”。在政治上,两千多年以来王侯将相莫不信经尊经,虽然他们往往尊经之名而不崇经之实,但经之全体得以保存,久而久之必有因而悟其实者出。一旦删经编经,取适合政体者用之,不合者删之,古人所作之经不存,经仅为“鼓万世民贼凶暴之焰而助之张目也”。^[16] 虽然陈黻宸极其忧虑全经之不存,古人之教将无以焉附,但他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癸卯学制颁布后,编辑经学教科书进入具体操作阶段。据研究者考察,山西优级师范学堂附设高等小学,将日人所作《论语类编》《朱子孟子要略》等书直接作为教科用书。1905年,《绘图四书速成新体白话读本》作为读经科教科书,却在用西学知识重新诠释经学,“解贱而好自专说到专制政体,非天子不议礼说到下议院权,尤与圣贤背道”^[17]。由此一来,在“以西证中”的过程中,在经学还未能成为“科学”之前,其面目已经似是而非。

与经学相比,诸子学被证明蕴涵了更为丰富的专门之学,改造的阻力也相对较小。有人认为“荀子以劝学为宗旨,其早得西学之太素”。^[18] 梁启超在1922年成书的《墨经校释》中,坚持称:“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19] (P. 1) 还有人云“余观周秦间诸子所言大抵与物理学有关系,不独墨子为然也。而《尔雅》一书,即可见当日小学之课程”,“此可知科学在古时虽椎轮大略,而未尝不略具模型,则周秦间人之学问,断非后世词章心性之空谈明矣”。^[20] 刘师培将这种比附表达得最为详备。1905年他作《〈周末学术史〉序》,说欲“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弃传统之学案体,而采西方学术体系,“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尝试将中国学术的分类体系从家学向“科学”转化。由此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等。^[21] (P. 504) 虽在论史,却排列出最为

完备的科学类目。

而且,诸子学也与西方“科学”质同。张继熙说“吾国当成周之末,为学界大放光彩时代,若儒家、若法家、若农家、若名家,类皆持之有故,言之有物,蔚然成为专门之学,何尝不可见诸实用。”[22]刘师培认为,从学术的起源上看,中国上古并非没有“科学”,“中国科学之兴,较西人尤早,然至周公时其用已衰,至孔子时其学并失”。[15]中国也有研究之法,“上古之时,用即所学,学即所用,舍实验而外,固无所谓致知之学也……古人之学,无一非基于实验”。但上古有征实之学,无推理之学,“故古人学术直质寡文,基于物理,与希腊古昔之学术相同”,“唐虞以降,学术由实而趋虚,穷理之学遂与实验之学并崇”。后宋明理学专讲究理之学,“实验之学亡,而后士大夫始以空言讲学,而用与学分”。[23]因此,只要恢复中国上古“学用一致”、“学崇实验”的征实之学,中国学术也能达到如同西方实验“科学”的程度。显然,国粹派学人混淆了学术实用与科学实验之间的差别,“西学古微”是他们共有的思想倾向。

在国粹派学人的论证体系中,“科学”是一个打通新旧,调和中西,以分类形式存在的学术总体,但其内部还是存在一个先进/落后的等级体系,世界学术因进化程度不同而有了层级之分。分科是“科学”概念的基本底线,分科之上的各种学术特质是可以不断累积叠加的进步指数。在这一广阔的学术范畴内,中学因为曾经是“科学”而得到价值重估,复兴古学被赋予了时代意义。但身处全球化的先进/落后的评价体系之内,中学不够“科学”已成不争的事实,“以西学证中学”看似是回归传统,实则是追慕西方,复兴古学不过是一个从传统寻找资源,使中国“科学”从低层级进化到较高级别的“科学化”过程。问题在于,国粹派的最初意愿不在研究而在保存,其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9](P.8),当不得不附会西方“科学”对传统学术进行等级提升,保存国粹的学术努力就只能是“离经”而“卫道”了。

二、“进化”的史学

国粹派“以西学证中学”的做法被梁启超斥为“好依傍”的“痼疾”[24](P.65),章太炎批评此举“形其穿凿”[25]。不过,类似做法应是异质文化交流中的初始状态,是近代学人面对强势西学自

内而外的正常反应。梁、章等人也或有中西比附的做法,但毕竟与他们的路数不同。1901年章太炎表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尘清廓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后世经说,古义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绝神话,而无新理以补救之。”他拟“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26](PP.330-331)作《中国通史》。此说与梁启超著《新史学》的初衷如出一辙,梁言“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史)。”[27](P.10)他们与国粹派学人的不同在于史学研究中主客体的转换:国粹派以中学为主体,裁减西学以证之,但中学在比附之下被拆解得七零八落;梁、章以西理为主观,中学为客观,他们于传统中看到的缺陷更多,相应要求更多的采补,肯定优胜之处的分量往往不及揭发短缺来得重。[28]

黎明时期的国故研究以史学的“科学化”为启钥。科学史学往往被分为两种:一是对史料进行谨慎的批判,力求写出所谓的“信史”,成为客观的或是批判的史学;二是对历史的演变作一个解释,寻求一种规律性的东西。[29](PP.586-587)梁启超的《新史学》显然为后一种,是阐述历史进化论的系统著作。1899年,王国维与他的老师最早将史学与“科学”联结,提出历史学是为有体系的“科学”[30](P.381),应显示历史间的因果关系,或一有机团体的内部结构。[31]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比较新、旧史书后提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32](P.1)对于史学的理解已与王国维无异。

1902年,梁启超的言语中体现出细微的变化,在《新史学》一文中出现“公理公例”一词。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

公例者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家出焉”。只有“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而“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7] (P. 7-10) 于是“求因果”与“明公例”相提并论，历史学必须发明“进化之公例”才能够称之为“科学”。“公理公例”几乎是晚清知识界的普遍用语，它包含了天理的原属性，如客观性、道德性，是来自西方的、近代的，可以为引介西方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的论证。[33] 这些正当性是建立在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归纳和演绎获得的可靠的、实证的知识基础之上的，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梁启超正是依靠这样的有效性建立起自身学术思想与行为的权威性。[34] 如《新民议》所载“及民智稍进，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学学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于群治种种之现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论之理论先，而实事之理论反在后。”[35] (P. 105) 至于这些“公理公例”是否就是真理，他们并没追究，也未曾怀疑。梁启超后来承认“原来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36] (P. 2)

梁启超的“公理公例”基本定格在进化的意义上，且不止于历史学，“凡人类智识所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7] (P. 114)。进化则以革命为前提，“实则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故破坏之事无穷，进步之事亦无穷”[38] (P. 62)。因此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并非关注学术本身，而是打着批判旧史学旗号的政治檄文。[39] 甚至可以说，梁启超在学术上的“科学”鹄的就是为中国寻找进化之迹，且观念先行，以为历史进化是万世不变的准则。即便是1903年梁启超从美洲回到日本后，激进的言论有所缓

和，但对于因“科学”而导致进化笃信不已。

梁启超对包括达尔文在内的进化主义的了解非常有限，并不关注进化论（特别是生物进化主义）学理本身，更关心的是进化论对国家复兴的强大的实践功能。这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是中国进化主义的总体倾向之一。[34] 20世纪初的趋新学人大多如梁启超一样对于进化论趋之若鹜，新的史学观念引发了对旧史的系统化改造。1902年汪荣宝编译《史学概论》，自称为中国“新史学之先河”。他认为中国旧史“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这种史书“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者之目的也”[40]。

所谓“科学”的统系首先是提倡通史，在通史中寻找中国进化的轨迹。1902年章太炎致书梁启超表达编写通史的意愿，“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41] (P. 139) 同年杜士珍责班固为断代史之始作俑者，“作断代史，失比较史”，历史无法因为上千年之比较而知因果。[42]

其次是改进史学的研究方法。蛤笑说中国传统史学可分三派：一为典制之学，一为议论之学，一为考证之学。但“上举三大派皆成已陈之刍狗”，今日最急者，“在以新学之眼光，观察已往之事实耳”。文中明确提出“怀疑—实验”的研究方法，谓“天下学问之途皆始以怀疑，而继以证实。惟能怀疑也，故能独开异境，而不为前人学说之所牢笼。惟能证实也，故能独探真途，而不为世俗浮说之所蒙蔽。因怀疑而证实，因证实而又怀疑，愈转愈深，引人入胜，新理之所以日出无穷也”。并援引“国民性”这一新概念，比较中国与他的异同，尝试以“新学之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历史。[43]

总体而言，“新史学”的倡导者大多向慕西学，服膺进化史观，相信史家述史应以记叙人群进化与竞争并阐明优胜劣败之理为主题，宜以发达群力刺激爱国情操为宗旨，[44] (P. 13) 而后学者基本也是在这一特点上评价梁启超以及他

的“新史学”。如周予同说，梁启超的“全部史观是建立在进化论上，而不仅以叙述历史的进化论为满足，并进而探寻历史演进的基因”，“梁启超由进化论而发起史学界的转变有不可磨灭的功绩”。[45] (PP. 539 - 540)

三、“求是”的史学

当进化成为衡量学术“科学”性的标准，或曰欧西的发展模式成为国人追慕的唯一的“公理公例”时，便有不同的声音出现。1902年前后的章太炎是进化论的追随者，1906年出狱后，再次流亡日本期间思想为之一变。这一时期发表的《征信论》《信史》等多篇文章，颇能代表他的心声。在有关章太炎的研究中，《征信论上》多被判定为1901年撰写，1910年正式刊载于《学林》第二辑。但经陈汉玉考证，认为《征信论(上,下)》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908年，《信史(上,下)》也应写于日本，时间在1907—1910年间，不应晚于1910年。[46]以往研究者多认为文章是为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治史”而写[41] (P. 125)，若将手稿时间与文章内容结合考察，可见文章中虽有批评“三统三世说”的言论，但《征信论》与《信史》都有具体的写作语境，目的是提倡“种族革命”，体现为学术思想上的保守主义。

章太炎在多篇文章中以“定则”、“定型”、“条例”等词汇等同于“公理公例”，认为以西方学说为绳墨规矩东亚学术实为大谬。在《征信论》一文中，他对于史学求因果并无异议，但是，因果相承只能表示历史之顺序，非不变之定则。“且夫因果者，两端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能独生；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端，忘其旁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颠倒而絀裂之，是乃殆以终身，弊之至也。”针对“近世鄙倍(辈)之说，谓史有平议者合于科学，无平议者不合科学”其谓“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耶？若夫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如班固、沈约、李淳风所志，亦可谓善于平议矣”。但“今世之平议者，其情异是。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下者犹近苏轼《志林》、吕祖谦《博议》之流，但词句有异尔。盖学校讲授，徒陈事状，则近于优戏，不得已乃多施平议，而已不能自知其故，借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

不灵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不悟史官著书，师儒口说，本非同剂。惟有书志，当尽考索之功，其论一代政化，当引大体而已，若毛举行事，订其利病，是乃科举发策之流，违于作述之志远矣。彼所持论，非独暗于人事，亦不达文章之体”。[47] (PP. 59 - 60) 文章中，“平议”一词从平心而论的持中言论引申为基于历史考察的学术评价或理论，章太炎否定了“科学”与“平议”之间的对等关系，实际上是否认基于西方社会考察得出的“公理公例”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相契合。

《征信论》下篇明言“今日社会学者”多患混淆“成事”与“类例”之病，此社会学者当指严复。当时革命者与改良者正就“种族同化”还是“种族革命”展开思想论争。严复翻译《社会通论》，借用甄克思的理论论证中国不适宜种族革命。在时人眼中，西方社会学从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开始便具有了“科学”的身份，此时的《社会通论》乃至严复的论断无疑被化约为“科学”的理论，符合“物竞存之旨”[48]。章太炎作《〈社会通论〉商兑》一文反驳“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豪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牴牾，则不敢容喙焉。夫不欲考迹异同则已矣，而复以甲之事蔽乙之事，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认为质学或许可以“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而社会之学，“若夫心能流行，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且社会学之造端，实惟毓德，风流所播，不逾百年，故虽专事斯学者，亦以为未能究竟成就。盖比列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必不极成。以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49] (P. 323) 概言之，章太炎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公理普遍存在，但东西方人文社会各有形态，不可削足适履以就西方“条例”。

在《信史》下篇中，针对进化论者的言论，“世皆自乱以趋治，言一治一乱者，非也；自质以趋文，言一质一文者，非也”，章太炎认为中国的历史事实应是“治乱之迭相更，考见不虚。质文之变，过在托图纬，顾其所容至广。政化之端，固有自文反质者矣。”[50] (P. 65) “文质”之辨乃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演进观念，“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

史”(《论语·雍也》)，“文质合一”是历朝历代的最高追求。按照传统观念，“质”由质朴之义引申为礼仪上的朴素无华，政治上的精简节约，道德上的敦本尚实；反之，“文”由修饰之义引申为礼仪上的举止规范，政治上的典章礼法，道德上的尊礼尚施。在历史的过渡时期，“文质”关系的辨析最为激烈，往往通过对“文质”内容的损益达到一种平衡。[51]但是，自西方观念进入，“文质”之关系转化为文明/野蛮的对立，“质”又可以理解为物质，引申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自质以趋文”正是建立在由物质发达进入文明之境的单一向度的、进化的逻辑关系之上的论断。文辞意义的转化说明评价中国历史的标准体系发生变化，章太炎此文便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反拨。

文章中，章太炎首先指出中国之“质”非特指物质，“械器之端，古拙重而今便巧，非古者质、今者文也”。中国之“质”在于匠人、乐人、冶人、梓人技艺之精，“求之异域，亦有不可得者”。械器的“便巧拙重之较，不与文质数。文质之数，独自草昧以逮周、秦，其器日丽，周、秦之间，而文事已毕矣。其后文质转化，代无定型”。其次，对于建立在考古学史前三期说之上的社会学进化论提出质疑。史前三期说在19世纪前期，由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首先提出，认为人类社会在史前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20世纪初被中国学者接受，章太炎在1900年的《馗书》初刻本《原变》篇中曾经提及。[52](PP. 27-28)但在本文中，章太炎明确表示由于中国地势广阔，资源丰富，欧洲的三期说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实情，这一观点在1925年的《铜器铁器变迁考》[53](PP. 81-86)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对当时流行的古器物学研究路向的反对。[54]进而，章太炎表示西方的社会学家以三期说辨文野，“其说难任，其持之亦无故。乃若姓有兴废，政有盛衰，布于方策者，回复相易，亦不可以空言诬矣”。甚至认为“今世远西之政，一往而不可乱，此宁有图书保任之耶？十世之事，谁可以匈臆度者？观其征兆，不列颠世已衰，法兰西则殆乎灭亡之域矣。后有起者，文理节族，果可以愈前日乎？则不能知也。”[50](P. 68)换言之，被视为“定型”的社会进化论无非是西方学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并不能揣度西方的未来，更不可评断中国之事。

以上各文，章太炎没有明确说明“科学”是什

么，只是认为以西方“科学”绳墨中国的社会政治格格不入。单就“科学”二字而言，章太炎很少专门论及，即便谈到也多是相反立论，以抨击学弊。如他将“科学”与中学对立，批评自贱中学者，特别是“适会游学西方之士”，“借科学不如西方之名以为间，谓一切礼俗文史皆可废，一夫狂舞蹈，万众攀裳蹀躞而效之”。[55](P. 475)相对于进化史学，他说有人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合科学，这种话更是好笑。……若是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就叫做科学，那种油腔滑调，仿佛是填册一样，又谁人不会说呢”，“说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科学，倒不得不‘削趾适履’，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56](PP. 67-68)在他文字中出现的“科学”一词常与名实如影相随，如谓“科学兴而界说严，凡夫名词字义，远因于古训，近创于己见者，此必使名实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纰缪”[57](P. 242)。又言“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58](P. 370)。因此，章太炎理解的“科学”当是“训说求是”，“循名求实”之学。

“史学是否是科学”是一个困扰了中国学人一百多年的大问题。王国维在1899年认为史学只要有系统，存因果，便可称为“科学”。但到了1911年，他说学有三类：科学、史学、文学。文学暂且不论，其中“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59](PP. 365-366)史学已在“科学”之外，二者存在“求理法”与“求因果”之别。王国维认为“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59](P. 366)言下之意，史学并非求是之学，历史上的是非、真伪都可以成为考察变迁之迹的史学资料。严复甚至基于这一原因否定史

学的专业性,他说“所不举历史为科者,盖历史不自成科”,“历史者,所以记录事实,随所见于时界而历数之,于以资推籀因果揭立公例者之所讲求也,非专门之学也”。^[60](P. 847) 史学是否成科,暂可不论,二人不约而同地定性史学为记述之学,不具备“科学”求真理的特性。

考察章太炎的认识,他曾经比较经学与诸子学的异同,以为“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61](P. 286) 换言之,经学即史学,为考证学。章太炎总结治经之法有六:“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62](P. 119) 可见,章太炎定性史学为求是之学,所求乃历史的真实,或不以“科学”名之,却有着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即王国维所谓的“求知识之真”。

但是,“客观之学”并不是“科学”。王国维认为“科学”在求真之外还存在一个“求道理之是”的更高标准,“科学”终究还是一个求公理公例的学问,且更强调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公理公例。而章太炎一直对于世人所言的“科学公理”心存抵牾,或是根本否定它的存在,如谓“今之所见,不过地球。华严世界,本所未窥,故科学所可定者,不能遽认为定见。”^[63](P. 32) 因此,按照王国维以“求真理”的标准衡量史学,因其无一定理法而非“科学”;按照章太炎以“求真实”的态度研究史学,史学根本无须追求定则理法,同样不能以“科学”衡量。史学不是“科学”已为二人共识,但还是有着不能成为“科学”,与不必成为“科学”的态度上的差异。

至于“求真”的方法,章太炎称赞清代乾嘉学者治学精神,认为“一言一得,必求其微”^[64](P. 155) 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梁启超则直接称清代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他对于“科学精神”的定义有四:“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

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65](P. 87) 其中的前两条,“求真”与“成科”都已被章太炎躬体力行,后二者章太炎最不喜闻,他明确批判过“有机体”理论,“正确之折衷”则相当于章太炎所说的“汗漫”之弊。^[61](P. 285)

“求真”与“成科”也被孙宝瑄表达为“破碎”与“完具”。1902年,孙宝瑄赞“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余则谓破碎与完具,相为用也”。所谓“破碎之学”是以音韵训诂为基的文字学,“苍雅之学,我国文字之根原也。本朝精治此学者,休宁之戴,高邮之王,诸家皆大有功。而近人多以破碎讥之”^[66](P. 566)。如梁启超曾经说过“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汨歿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65](P. 87) 它更广泛的意义上指无系统之学,如梁启超曾致书黄遵宪想作《曾文正传》,黄遵宪复书对曾氏赞赏有加,认为“其学问能兼综考据、词章、义理三种之长,然此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科学、之哲学未梦见也”。^[67](P. 597) 所谓“完具”,指的是学术具备的理论系统化形态或是追求系统的行为,却不等同于梁启超等人所谓的“进化”系统。章太炎说“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授者众。”^[68](P. 70) 关于“破碎”与“完具”的关系,孙宝瑄认为,“完具不由破碎而来非真完具,破碎不进以完具,适成其为破碎之学而已”,而“昔人多专治破碎之学,今人多专治完具之学”,都不免偏颇,唯有章太炎能合二为一。^[66](P. 566)

用今天的语言表示,“破碎”与“完具”大致相当于分析与综合的研究方法。章太炎自述其学取法西方,“西方论理,要在解剖,使之破碎而后能完具。”^[66](P. 566) 1909年,章太炎在《致国粹学报社书》一文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治学方法是“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由于汉学短拙,今文汗漫,“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然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倡狂无验之辞,以相诋耀,则弊复由是生”。^[69](PP. 497-498)

从孙宝瑄的评价来看,章太炎的学术研究可谓完备,但是否近于“科学”,他人则各有见解。当时正与章太炎论战的“新世纪派”采用纯粹的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中国学术,根本不认为考据学与“科学”具有同一性。[70]1919年,毛子水说章太炎所承的疏证学“重证”、“求是”的心习就是“科学的精神”,虽不免有些“好古”的毛病,却是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71]胡适直接将“汉学”与“科学方法”挂钩[72],明确表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73](P.8),至少说明“整理国故运动”在求真的问题上与章太炎一脉相承。

但批评的声音同在。曹聚仁认为章太炎著《国故论衡》,“仅能止于有组织,未可谓其有系统也”。他给出的国学定义是“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去记载思想之生灭,分析思想之性质,罗列思想之表述形式,考察思想之因果关系。所谓“合理的”,即“客观性之存在”;“组织的”,即“以归纳方法求一断案,以演绎方法合之群义”;“系统的”,即“或以问题为中心,或以时代为先后,或以宗派相连续,于凌乱无序之资料中,为之理一纲领也”。简言之,“国故先经合理的叙述而芜杂去,继经组织的整理而合义显,乃入之于系统而学乃成”。章太炎的国学研究还只是“国故”,尚未可称为“国故学”[74](PP.60-71),在系统化的程度上离“科学”尚有距离。

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称章太炎为“近代科学整理的导师”,将其学术成果定格在诸子学的研究,认为“他的解析思维力,独立而无援附,故能把一个中国古代的学库,第一步打开了被中古传袭所封闭的神秘堡垒,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的奥堂,第三步根据自己的判断力,重建一个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见的古代思维世界。太炎在第一、二步打破传统,拆散偶像上,功绩至大,而在第三步建立系统上,只有偶得的天才洞见后断片的理性闪光”。^①这一科学系统不完全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还必须有天才的禀赋。但在章太炎的自我表述中,诸子学乃“义理之学”、“主观之学”,他曾说“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最有学问的是周秦诸子了”。[75](P.117)换言之,诸子学属于哲学的范畴,并不是“科学”,侯外庐的评价与他的自我认知差距甚大。

在近代新史学的研究体系中,钱玄同将章太炎列入“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第一期。周予同说章太炎是清代经古文学的最后大师,他潜心治学的方法,承袭古文学派的皖派的考证学,就其学统来说属于旧派,但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是现代新史学的渊源之一。[76]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说“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44](P.2)他分新史学为考证、方法、史料、史观、史建等五个学派,但各学派都没有将章太炎考虑在内。2000年,王晴佳讨论史学“科学化”时,将1910至1920年称为史观到史法的转变期,标志性的人物有王国维、胡适与梁启超三人,同样不包括章太炎,只是认为他对于历史进化论的厌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29](P.603)或者说,按照他们二人的判断,章太炎与以“科学化”为特征的新史学并无太大关系。如此排列,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围绕章太炎的国学研究讨论史学“科学化”的问题,得到的结论却是如此大相径庭。以上表明“科学化”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如果忽略了对于学术标准的“科学”概念的历史性考察,混淆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的内涵,最终将掩盖历史的复杂性。

桑兵曾经寻绎“新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认为各家主张可大别为三类:自称、他指与后认[77],此方法同样适用近代学术“科学”性质的判断。时至今日,后人虽然普遍承认国粹派在中国“科学化”的过程中有启沃之功,但基本不会认同他们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竭力追求“科学”史学的梁启超,被追认为科学史观派,身后却鲜有人赞许其学问是“科学”的。关于章太炎治学方法“科学性”的判定,本身就是一个后发于事实的历史命题,在自称、他指与后认三个方面存在差距。

差异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同一语境下“科学”概念的意义多歧,使得学术转型可以各取其道,多向路发展。在章太炎旅日期间,“科学”一词在中国

^①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本书是在侯外庐的旧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的基础上重新订订成书的。

日益流行。但“科学”往往与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进化论紧密勾连,甚至表达为“新世纪派”的唯科学主义。章太炎本人极力反对西方成例,宣扬学术思想上的“依自不依他”,反“科学”的一面更为突出,他不可能以“科学”概念判定自己的学术性质。但是,当他努力与“科学”保持距离,却在治学方法上不自觉地贴合了西方的“科学方法”,而自己却并不自知。章太炎以及同时代的学人,无论是自觉或是无意识,无论是拥抱还是抗拒,其实都已经身处“科学时代”,运用着似是而非的“科学”概念从事着条理旧学、构建新学的学术实践。

另一方面,“科学”概念的意义流变使得学术评价体系发展转化,前人的“科学化”探索呈现更为复杂的面目。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概念开始从一个宽泛的,以分科为特征的学术集合体过渡到以科学方法和精神为核心的“整体性”的学术体系,引发了新一轮国学研究范式的转移。[78]胡适急欲寻找能够与“科学方法”接榫的本土资源,中西考据学由此连接,章太炎的“求真”便被赋予了科学性质;追求学术“独立自主”的侯外庐极其欣赏章太炎的文化自决性,于是看到了“破碎”与“完具”与“科学”三部曲的某些契合。而曹聚仁、许冠三、王晴佳等人以更为严格的西方科学作为标准,自然判定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不够“科学”。后人由于研究目的、场域的不同,选取的“科学”标准各异,对于前人学术性质的评价亦不可能完全一致。“科学”作为一个意义多歧、流动可变的历史概念,直接造就了中国学术“科学化”的路径多元而且曲折。

参考文献:

- [1]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4]张帆《“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5]邓实《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6]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7]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
[8]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
[9]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刘师培《论古学出于史官》,《国粹学报》,1905年1期。
[11]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

- 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2]陈黻宸《经术大同说》(未完),《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13]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4]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5]刘光汉《孔学真论》,《国粹学报》,1906年第5期。
[16]陈黻宸《经术大同说》(续),《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2期。
[17]朱贞《晚清学堂读经与日本》,《学术研究》,2015年第5期。
[18]《国粹略述》(续),《四川学报》,1905年第16期。
[19]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0]陆海《东方旧文明之新研究》,《进步》,1911年第1期。
[21]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22]张继熙《叙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23]刘师培《古学起源论二》,《国粹学报》,1905年第11期。
[2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5]章太炎《某君与某论朴学报书》,《国粹学报》,1906年第23期。
[26]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8]夏晓虹《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9]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30]王国维《〈东洋史要〉序》,《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31]〔日〕藤田丰八《序泰西通史》,《政艺通报》,1902年第13期。
[3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3]金观涛、刘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第10期。
[34]王中江《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35]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6]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7]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8]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9]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40]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9期。
[4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42]杜士珍《班史正谬》,《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4期。
[43]蛤笑《史学刍论》,《东方杂志》,1908年第5卷第6期。
[4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 [45]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46]陈汉玉《章太炎手稿用纸》,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国图文化经典文化推广中心主办《文津流觞》2003年第10期。
- [47]章太炎《征信论下》,《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48]《自存篇》,《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5期。
- [49]章太炎《〈社会通论〉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50]章太炎《信史下》,《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51]杨念群《“文质”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史林》2009年第5期。
- [52]章太炎《原变》,《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53]章太炎《铜器铁器变迁考》,《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54]陈峰《唯物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铁器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 [55]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56]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著、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 [57]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58]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59]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 [60]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61]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62]章太炎《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63]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64]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6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 [6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67]黄遵宪《黄遵宪集》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 [68]章太炎《秦献记》,《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69]章太炎《致国粹学报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70]鞠普来稿《男女杂交说》(燃评论),《新世纪》1908年第42卷第5号。
- [71]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第1卷第5号。
- [72]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科学》,1920年第2、3期。
- [73]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74]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
- [75]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章太炎的白话文》,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 [76]周予同原著、朱维铮编校《经学和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77]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 [78]张帆《民初国学研究中“科学”范式的变迁——一个概念史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An Exploration on the Change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Path of Chinese Academic in Late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Modern Historiography

Zhang Fan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Science” is a historical concept, which accompanies with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Science”, modern scholars started their own exploration on “scientific” path of Chinese academic. Guo-eui School, treating “Science” as a reconciliation of old and new academic areas, carried out the exchange of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academic and revival of ancient school. Liang Qichao, who followe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thought “Science” as “the general rule of Justice” about human evolution. However, Zhang Taiyan opposed to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 in the West as the rules of “Science”, but his method of “scientific nature” has become a controversial topic for a long time. In “Science Times”, modern scholars, whether consciously or not, have been armed with their own political ideals, using specious “Science” concept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Chinese academic.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Science”; Chinese academic; “scientific”

(责任编辑:沈松华)